

俞平伯书信集

河南教育出版社



K825.6 / 140

俞平伯书信集

河南教育出版社

俞平伯书信集

孙玉蓉 编

责任编辑 张玉林

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875印张 326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800册

ISBN 7-5347-1039-1/I·36

定价

7.25元



俞平伯小传

俞平伯(一九〇〇.一.八~一九九〇.十.十五),名铭衡,字平伯,以字行。浙江德清人。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的曾孙。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大学,一九一九年末毕业。在此期间,他在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,开始创作白话诗和白话文。他是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主要成员,也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。他一生引为光荣和自豪的,是他亲身经历了“五四”运动的洗礼。他还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。一九二二年一月,他和朱自清、叶绍钧、刘延陵共同创办了五四以来第一个新诗月刊。他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、上海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等大学任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。一九五二年,他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(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任研究员。他参加了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,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。他是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又是政协第五、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他是九三学社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代表,又是九三学社第四、五、六届

中央委员会委员。一九八〇年，他还被聘为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。

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红学家和古典诗词曲研究专家。他的主要著作有：新诗集《冬夜》（一九二二）、《西还》（一九二四）、《忆》（一九二五）以及旧体诗集《遥夜闺思引》（一九四八）、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（一九八九）和《古槐书屋词》二卷本（一九八〇）等。散文集《剑鞘》（与叶绍钧合集，一九二四）、《杂拌儿》（一九二八）、《燕知草》（一九三〇）、《杂拌儿之二》（一九三三）、《燕郊集》（一九三六）、《古槐梦遇》（一九三六）、《俞平伯序跋集》（一九八六）等。红学论著的代表作是《红楼梦辨》（一九二三），后改版为《红楼梦研究》（一九五二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《俞平伯论〈红楼梦〉》（全二册）是他红学论著的集大成。另外还有古典诗词研究著作《读〈诗〉札记》（一九三四）、《读词偶得》（一九三四）、《清真词释》（一九四八）和《唐宋词选释》（一九七九）等。

敬悼俞平伯先生

千年诗垒焕新容
青兕初来气吐虹
春草落花人代速
岗头矗立见苍松

——祝贺俞平伯先生学术活动 65 周年二绝之一(1986. 1.)

10 月 23 日上午,我从昌平开完“吉林故事卷”终审会回到学校寓所。少息之后,随手翻阅书几上本月 20 日出版的《文艺报》,在第 1 版上看到俞先生逝世的消息。再检看 17 号的《光明日报》(在昌平六亭饭店的几天里,因为工作忙,没有找报看),也有同样的报道,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,姓名前并冠以“著名文学家”的称号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一时使我不禁愕然。

不错,俞先生已经享受了人生的高年,并且从青年时代起,就为了祖国的新生和光荣,在文艺和学术的领域里竭尽聪明才智,取得了光辉的成绩。他今天的逝世,从他个人看,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了。但这到底是理智上的说法。从我们的感情上说,却总觉得他还应该活得长久些。他的突然离去,总不免给我们留下惋惜和绵绵哀思。

我和俞先生的交往,并不算早(虽然也已经 40 多年了)。但是

长时间通过学艺上的接触——心灵的接触，对我来说，我们的关系却是并不浅鲜的。这得回溯到“五四”时期。俞先生年龄上虽然只大我 3、4 岁，但他在文化的接触和滋养上，却比我大大占了优势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很早就进了北京大学。而这所大学当时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熔炉。他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，从此毅然投入新文化阵营。他抛开旧诗，改作新诗——他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间创作新诗成绩比较突出的两诗人之一（另一位是康白情）。除新诗之外，他也写作社会、诗歌评论及抒情散文。他是早期新思想、新文学团体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（稍后还有语丝社）的重要成员。

俞先生在“五四”前后的学艺成绩是很显著的。他连续出版了新诗集《冬夜》（1922）、《西还》（1924），刊行了文艺论考集《红楼梦辨》（1923）和散文集《剑鞘》（与叶圣陶合作，1924）。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作品发表（如《雪朝》诗集里的专辑）。仅从上述著作，我们就可想见他的创作力的健旺和影响的巨大了。当时 20 岁左右的我——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，正是被这种新文化潮流推动着前进的（虽然在稍后的时期里，我逐渐在学艺上摸索出自己的道路）。

我初入学艺界，在文艺创作和学术探索上，都曾受到俞先生的影响。在这里，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。1928 年冬，我在杭州写了一篇题为《西湖的雪景》的散文（这篇文章，稍后收入我的散文集《西湖漫拾》，并被一些选本所选载，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），内容是讲雪中游西湖（踏雪登韬光庵）的观察和感兴。它与俞先生的名文《陶然亭的雪》粗看去尽管只有题目中的对象（雪）彼此相关，其它并无什么雷同的地方，而我至今也不能明确指出它所受影响的痕迹。但从当时的情形看，它无疑是受过《陶然亭的雪》的启发的（选题方面的启发）。

此外，对文艺的理解，我当时也多少有得益于俞先生的地方。

俞先生在 20 年代曾在《诗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的论文(1922),是主张诗的群众化的。据他自己说,该文受了列夫·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。这自然不错。但是,从这种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看,却与当时学界盛行的“平民主义”密切相关。我当时也是托氏《什么是艺术》中有关见解的信奉者,又是受着“平民主义”薰陶的知识分子,但头脑中这种文艺观念(诗的群众化)尚较为漠然。而俞先生却对它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。这就不但唤起了我的共鸣,而且也使我在观念上更加明晰和确定。也就是说,他的论文,使我在文艺思想上沾了光。

在新文化运动后的那段时期里(约摸 10 年左右),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,在学艺上受到俞先生等先驱者们学绩的滋润,对于这一点,我们不仅当时已意识到,而且是对他们怀着敬慕和感谢之情的。这自然要反映到我们的文字上。记得那是 1928 年的冬天吧,我写了一篇《平伯君的散文》,是抒情地写述我对他的散文集《杂拌儿》的感应的。文章一开头就说:“近来常常来往西湖堤上,每到西泠桥附近,望见了遥对着南岸诸山的俞楼,便教我想起曲园老人和他的曾孙平伯君。”在这段文章的后半又说:

……平伯君呢,虽然没有生平的交谊,但不特名字是很稔熟的,他的心音尤其常常洋溢于我的耳鼓、心头,而使我有不易磨灭的留影。当我站在俞楼前的柳树下,悄对着幽静的湖波、烟岩,口上不觉微微地哼出这样梦也似的诗句:“……卷帘爱此朦胧月,画里青山梦后诗”(节录俞先生所作《偶忆湖楼之一夜——作者)。我对他,是怎样蕴蓄着沉挚的遥想啊!

从这几句少年稚气的文字里,可以看到当时我这个文坛的小弟弟,是怎样钦佩和仰慕着那些大哥哥们了。

我跟俞先生的晤面和较多的往还，是在建国前夜和 70 年代中期以后。1949 年 5 月，我从政治避难地香港应邀来北京，任务是协助筹备并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。到北京不久，我就到老君堂去拜访俞先生。对于自己多年熟读过他的诗文、由衷景仰过的诗人和学者，一旦得以握手言欢，那愉快是不用说的。此后，我们都置身于同一个文艺机构里，会面的机会是常有的。但由于彼此都忙碌吧，却好似没有象初见时那样畅谈过。

我与俞先生更多地接触和向他讨教较多的，是在文革的后期。由于阴差阳错，在 1957 年对知识分子的扫荡中，我成了“垃圾”，文革中更是劫运难逃了。经过不断的烈风暴雨的袭击，接着来的是“置散投闲”。但象我这样的天生的书呆子，是不惯于优游度日的。于是，旧习难忘，加上一些同遭遇的朋友的相励，我重新燃起了诗炉的火。除习熟的格律诗之外，还重新学起了填词（年青时虽然学填过，但到底没有入门）。累月经年，案头稿子不免逐渐增多起来。于是，我想到了请教高明，并且首先想到的就是俞先生（此外，就是叶圣陶先生）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带着稿子去永安南里他的新居去请他评点，当面领会他的教言。这样经过了约有一两年，他评阅过的小册子也有了两三册。后来虽不常见面，但书信却是常通的。特别是每逢新年或春节，我总是要给他寄去贺年片（片中往往附上一首近作），他也大抵总是要回片并附诗的。

俞先生对于我国古典诗词（特别是词）的工夫和体会，能力是很深的。这一点，我想看过他的《读词偶得》或《唐宋词选释》等著作的同志，都不会有异议。他对于朋友的作品，固多奖掖之处，但是审阅起来也是极认真和严格的。记得我请他评审的一个册子，里面收入诗词三四十首，但是他用红笔圈定的（也就是他认为比较好的），

大概却只有三分之一。他觉得好的篇章和句子固然不惜赞词，但他认为不妥或失律的地方也一定不客气地指出。他的态度就是这么诚恳、率直！古人所谓“友直”，正是指他这种态度说的吧。比起他高明的学识来，这种态度更是使我所感动的。

俞先生的待人接物，是有“古风”的，这从他对朋友的往来书信处理上亦可看出（上面说的他审阅友人稿子的认真，当然也是这种“古风”的表现）。10多年来，我们通了许多信。他的信大多是回答我的问安、呈稿请教、或年节祝贺的。现选录两则如下，以见一斑。

静闻先生锡鉴：

以上月地震，承手教问安，感谢。新诗并得浣诵。“露宿人如市”，写实佳句也。五、六句峭劲（原文是：“星球有成毁，人力战危艰”。——作者）且有气概，老健之笔，为佩。弟仍楼居，差幸无恙。附近有一小棚，精结，时亦信宿，堪释注。近多传闻，既不辨其真伪，且官方通知，亦每无验，只可听之。想旬后总可安谧也。草草不尽，即候暑祺。

弟平伯顿

旧中元节

1976年地震后，我去信询问俞先生的安康，并附上当时所作五律一首。这是他当时的回信。另一则是：

敬文我兄赐鉴：

奉贺柬，兼得诵远游佳句。耄岁清健，胜弟之卧疾多矣。附上去秋小诗一首，希晒正。今岁文联开会，当可图再晤。匆此，复颂文安，并贺岁釐。

弟平伯上

元月三日

这大概是 1979 年初，他接到我的贺年片和《兰州杂诗》后写的回信。他所附小诗，记得是讽刺“四人帮”的。我们从这些书简中，可以看出俞先生对朋友的关心和没人微长的为人风度了。俞先生的许多著作，近年都已刊行或复印了。我希望有青年学者再收辑他的手简付印。这也是俞先生学艺和人格的组成部分，并且因为书简体裁的关系，于此更能无遮拦地反映出他的性格、爱恶与癖好等吧。

象上面所看到的，俞先生在手简里往往附上诗作（有的是专为寄诗而发的），计我前后收到的，不下一二十首。内容有的是歌颂新社会新事物，有的是怀念旧友，也有的是讽刺坏人坏事的。撇开那老练的艺术功力不说，单就他所关心的世界境涯来讲，也足够让人敬佩了。他决不是只会老槐树下寻梦的人，也不仅仅只是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。他的胸膛里实在有着更广阔的天地。

他寄我的所有诗篇，可惜这里限于篇幅，不能多所举述。但我无论如何也要在此举个例子。试看他的《辛亥革命 70 周年的纪念》七绝一首：

惊雷起垫楚江头，
今日红旗遍九州。
玉宇秋明人尽望，
同心亿兆巩金瓯。

此诗大概是 80 年代初，他发表在海外的报刊上的（他寄我的剪报，并没有写上报刊的名字）。在这首小诗里，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他老而弥坚的爱祖国情愫和他那丰瞻的诗语，就连他的健实而韶秀的书法，也同样是让我们赏玩不置的。

本月上旬，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去看望冰心，并祝贺她的 90 岁大寿（“心香一缕祝生辰”）。在谈到当前新文学和老一辈人物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了夏衍和巴金。最后她说还有一位比她年长且健在的作家，那就是俞平伯先生。我们正为这些文艺家的健在而高兴。没料到，不过 10 天，俞先生竟先离开我们而去了。

有生必有死，这是生物的自然规律，所谓“万物之灵”的人类也不能自外。一个人，不管他的地位如何，只要在世时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尽了他自己的职责，他便死而无憾，就值得活着的人去怀念，乃至去学习的。俞先生正是属于这个行列的人。几年前我在贺俞先生诗中的末句云：“岗头矗立见苍松”。现在，他的作为物质的“苍松”倒下了，但他留在人们头脑里的精神的“苍松”，却将长久翠绿而挺劲！……

钟敬文

1990. 10. 31 于北师大小红楼

序

天津社会科学院孙玉蓉女士是一位有心人。多年来，她对俞平伯老师的研究工作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为中国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她先后编辑出版了《俞平伯研究资料》、《俞平伯序跋集》、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和《俞平伯散文选集》等书；这些书，是研究俞平伯的第一手资料。

编选《俞平伯书信集》是玉蓉女士多年来致力的工作之一。为了编辑书信集，她不辞劳苦，到图书馆寻觅资料，八方发函向俞老师的亲友们征求书信；像蜜蜂采蜜一样，点点滴滴搜集起来。

俞老师书信的前后时间跨度达70年之久，数量极多；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很多友人珍藏的书信被焚毁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这次搜集到的书信，大部分是七八十年代写作的。

俞老师写信措词严谨，一丝不苟。其内容，大多是有关学术问题的探讨；这本身就是一种创作。1966年前，他在写给孙伏园的信中，就鲜明地提到“一息尚存，一息不懈”，这正是他毕生的座右铭。

1969年11月，俞老师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劳动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但他能处之泰然，充满乐观。他与农民交朋友；他为自己能够体验农村生活而感到兴奋；他为庄稼的丰收而感到喜悦。他丰富的思想感情，反映在他那动人的《息县杂咏》的诗篇中。

他对当年所居的“陋室”，曾赋诗二首。诗云：

炉灰飘堕又飞扬，清早黄昏要扫床。
猪矢气熏柴火味，者般陋室叫“延芳”。

螺蛳壳里且盘桓，墙罅西风透骨寒；
出水双鱼相煦活，者般陋室叫“犹欢”。

农村的居住条件自不必说，和他北京的古槐书屋是无法相比的。由诗可知，他对自己居住的小屋却寄予很深的感情，给它起了“延芳”和“犹欢”这样雅致的室名。在他眼里，农村的景色是那样美好：

落日红霞映水邨，西塘小坐似公园。
晚凉更对柴门月，一岁情踪共讲说。

1971年1月，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怀下，俞老师和其他十位知名学者，返回北京，迎来70年代后的新生活。

我和俞老师通信，始自1978年，先后12载。他惠我的书信有150封之多，使我从中受到很深的教益。这些书信已经编成《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》出版。

1989年，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先生的介绍，我和孙玉蓉女士在北京饭店会面。她谈及编辑俞老师书信集的一些情况，盼我从旁协助。我义不容辞。当年12月，我拜会俞老师时，他和女儿俞成也提起这件事，表示对诸如信件征集的困难等一些事有力不从心、爱莫能助之感。足见此项工作的艰难。

时代的变迁，岁月的流逝，许多学者已不在人间，这类书信若不及早“抢救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搜集起来就会更为困难。玉蓉女士一边搜集、整理书信，一边寻找“婆家”，征求出版单位，希望让俞

老师见到此书的出版,其用心之良苦,可见一斑。

可惜,1990年10月15日,俞老师在北京逝世了。他未能看到书信集的出版。这确实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。

1991年1月23日,农历“腊八”,是俞老师91岁生朝,也是第一个忌辰;适逢我从哈尔滨抵北京。是日早上,我自北京饭店驱车前往三里河,在俞老师和师母的遗像前鞠躬致祭,顿时百感交集。一代国学大师,著作等身,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,薪尽火传,现在正是总结和发扬的时候了。

为书信集,玉蓉女士问序于僕,乃述所感,以慰俞老师在天之灵;同时,也对她的工作表示敬意!

周颖南

1991年2月4日初稿,4月26日

改作于新加坡映华楼

目 录

敬悼俞平伯先生	钟敬文(1)
序	周颖南(1)
致白采	(1)
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	(1)
附 跋语	(2)
附 白采致俞平伯书(节录)	(3)
致卞慧新	(4)
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	(4)
致陈次园	(5)
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	(5)
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	(5)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	(6)
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	(6)
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二日	(7)
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	(7)
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	(8)
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	(8)
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	(8)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	(9)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	(10)